



暨南大學
JINAN UNIVERSITY

欧洲中世纪早期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主办：暨南大学 文学院 历史系

协办：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

广州 2013 年 11 月 23-25 日

目 录

陈志强

晚期古代与早期拜占廷研究 2

崔艳红

国际著名拜占庭学家亚历山大·卡日丹 6

侯树栋

关于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 12

康 凯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问题探析 24

李隆国

矮子丕平称王与加洛林王朝的兴起 40

李云飞

从墨洛温到加洛林：有关751年丕平改朝换代的四个问题..... 50

李云飞

在诸子均分与帝国一体之间：817年虔诚者路易的传国计划探析 92

马克·阿莫诺、蔺志强

英国玫瑰战争的学术解读模式变迁 124

刘林海

从公民福利到社会救济——古罗马社会救助初论	128
龙秀清	
西方学者对西欧中古宗教生活的解读	142
马克·阿莫诺、孟广林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国家的形成 1250-1450	152
施 诚	
东西方跨文化误读的典例——教士约翰的传说	162
王亚平	
浅析中世纪早期西欧采邑制形成的社会基础	178
武 鹏	
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及其《教会史》	192
夏洞奇	
奥罗修重放光芒?	212
谢丰斋	
论中世纪欧洲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走势	226
徐家玲、李继荣	
“米兰敕令”新探	244
张 攸	
中世纪史料中的教廷枢机之起源及其职责	260
张小贵	

神赐荣光：胡裔墓葬所见半人半鸟形象再考 276

赵文洪

有关公地制度的基本概念 286

朱君杙

试论罗塔凌吉亚国王罗泰尔二世离婚案风波迭起的历史动因——以加洛林时代的历史文献为史料依据 298

暨南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近期未发表的论文

邵 笑

论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与美国—北越 巴黎秘密谈判（1969—1972）. 312

张传宇

沦陷时期广州日本人居留民研究 336

张 坤

18-19 世纪英美基督教复兴运动中的福音派 356

张廷茂

葡萄牙宪政进程与海外省体制的建立 368



暨南大學
JINAN UNIVERSITY

欧洲中世纪早期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主办：暨南大学 文学院 历史系
协办：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

广州 2013年11月23-25日

晚期古代与早期拜占廷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陈志强

内容提要：晚期古代或者古代晚期是当今国际学界的新兴学科，其研究框架和思路与传统不同，富有新意。仔细考察该学派就可以发现，晚期古代研究与早期拜占廷研究十分相近，其主要领军人物和研究力量大多来自专攻早期拜占廷研究的学者，其涉及的时空范围又与早期拜占廷研究大体吻合，该学派的研究成果如果算在早期拜占廷研究领域也不为过。由此看来，晚期古代就是早期拜占廷研究的扩大版，或者至少可以认为晚期古代学派是早期拜占廷研究创新的结果。

关键词：晚期古代、拜占廷研究、学术创新

“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是指从古典希腊罗马时代末期（或公元3世纪）到8世纪初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主要描述以地中海和欧洲为中心，包括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近东地区出现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空范畴恰好就是拜占廷早期历史研究的对象。关于“古代晚期”具体的时间段还存在争议，狭义上，指的是从君士坦丁一世到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大致从3世纪到7世纪这三百年间；广义上，则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后延至公元800年，以穆斯林的军事、文化入侵为终结。¹作为一种观察欧洲地中海中古早期历史的视角，学者们对这一分期不断提出讨论与修改。事实上，“古代晚期”这一概念早就出现在瑞士学者布克哈特（J. Burckhard）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1853年）书中，后来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艺术学科重要创始人里格尔（Alois Riegl）在《晚期罗马的工艺美术》（1901年）一书中提出了“Spätantike”（late antiquity）的概念，并被德国学术界接受。²但当时学界提出这一概念时，是将古代晚期研究与晚期罗马帝国研究结合在一起，局限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内，重点研究传统的古典语言学、古代历史、早期基督教神学、考古学方法等。1938年，法国古典史学家马罗（H.I. Marrou）在《圣奥古斯丁与古典文化的终结》一书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³真正推动“古代晚期”研究有所突破是20世纪的一批英国拜占廷学家，他们使“古代晚期”的理论观点逐步系统化，并成为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在英语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这主要归功于爱尔兰裔学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和牛津学者卡梅隆（Averil Cameron）等人的努力。

¹关于古代晚期断限的讨论参见 A. Macone, “A Long Late Antiquity? Consideration on a Controversial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vol.1, No.1, 2008.

² A.李格尔著，陈平译：《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³ Henri-Irénée Marrou, *Sain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 Paris : De Boccard, 1938.

事实上，古代晚期并非学者们随意杜撰出来的，而是在长期从事早期拜占廷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思维框架，建构起来的一种新学术坐标。其研究思路与传统不同，富有新意。但是，仔细考察该学派就可以发现，古代晚期研究与早期拜占廷研究十分相近，无论是研究主体还是研究客体，即主要领军人物和研究骨干大多来自以前专攻早期拜占廷研究的学者，而研究涉及的时空范围又大体与早期拜占廷研究暗合。

譬如古代晚期学派开创者彼得·布朗就是我们熟知的早期拜占廷研究的学者，他（1935-）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曾在牛津接受系统的拜占廷学教育，40岁进入牛津大学任教，上世纪80年代在早期拜占廷研究领域建立起稳定的学术地位，后远赴北美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等多所名校讲授历史课程。1966年，他于牛津大学发起“拜占廷与北方和东方的邻居们：公元500-700年”这一新专业，标志着“古代晚期”系统研究的开始。1971年，布朗撰写的通俗读物《古代晚期世界》出版，¹标志着“古代晚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以古代晚期为研究背景的几部著作。我们不知道促使彼得·布朗转向新学术方向的动因是什么，但是作为早期拜占廷研究的专家，他一定是有感于传统研究陷入低谷迫切需要学术创新，才毅然决然挑起古代晚期的大旗。

又比如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历史著名学者卡梅隆（1940-），从1989年开始一直担任牛津大学“晚期古代和拜占廷研究教授”。她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专门研究查士丁尼治下的拜占廷帝国社会。后来，她与彼得·布朗的交往中深受后者的启发，逐渐将其早期拜占廷研究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研究视角更为开阔。但是，我们从她坚持开设的牛津课程上看，她没有放弃其早期拜占廷研究的优势，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

他们两位是当今国际“晚期古代学派”的旗手，在他们不懈的推动下，该学派已经成为欧洲上古中古史研究的一大热点，相关学术成果丰硕，后备人才辈出，如今已经在欧美各地担当起学术重任。作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人，彼得·布朗在其早年接受的系统的拜占廷学教育中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后来因其具有释读希腊、叙利亚和阿拉伯等多种文本的天赋而蜚声学术界。在其他长期执教英美名校的生涯中，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成长为从事古代晚期研究的专门人才。本人在普林斯顿大学希腊文化研究中心从事合作研究的那个学期期间，曾与他多次在学术活动中谋面，进行过简单的交流，其睿智活跃的思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晚期古代研究的学人多自早期拜占廷研究领域发展而来，这是与古代晚期和早期拜占廷研究内容多有重合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从两者的时空范围可以看出这一点。古代晚期研究的范围从狭义上看，指的是从君士坦丁一世到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大致从3世纪到7世纪这三百年间，而这一时空定位恰好就是早期拜占廷研究的时空范围。如果从广义的古代晚期时空范畴看，则可追溯到公元50年或150年，一直到公元800年，也就是以穆斯林的军事、文化入侵为终结。而这样的时空定位，其主题仍然是早期拜占廷研究的范畴。考虑到这一时间段欧洲中古历史资料的积累，那么无论是古代晚期还是早期拜占廷研

¹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倚重这个时期的东地中海史料，特别是早期拜占廷史料。可以说，古代晚期研究变换的是研究思路而不是基本史料，是指导理论而不是具体的史料梳理。

从古代晚期学派的研究成果看，它们都不能脱离早期拜占廷研究的基础。布朗的代表性作品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其1971年完成的通俗读物《古代晚期世界》、长篇论文《古代晚期圣徒的兴起及意义》、1996年出版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1998年参与编写的新版《剑桥古代史》第十三卷“帝国晚期：公元337年至425年”、1999年主编的大型辞书《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研究指南》、2001年撰写的《阐释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论集》、2002年撰写的《晚期罗马帝国的穷人与领导权》和《管窥：罗马的富庶与衰亡以及基督教在西方的形成》等，¹卡梅隆在其《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公元395—600年》中对此做了充分的总结。²这些成果虽然多冠以晚期古代的题目，但其实质与早期拜占廷研究密切相连。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晚期古代学派与早期拜占廷研究进行联系似乎还不妥当。需要注意的是，“晚期古代”学派在早期拜占廷研究的基础上多有创新之处。

首先，其史观不同。“古代晚期”研究的倡导者们不同意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经典解释，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晚期并不是一部衰亡的历史，相反，从公元3世纪大危机时代前后，到8世纪穆斯林势力进入地中海世界之前，欧洲地中海世界经历了500年左右的重要变迁和革新。这种变化不像自文艺复兴以来传统史学理论认为的那样完全是消极的、倒退的，反之是多元文化冲突交融且充满活力的，是旧、古典时期文化向新时代的转型，是多元文明和地缘政治的结合，也是一种新型文化萌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多种复杂地缘政治因素产生和相互冲突的时代。例如基督教文明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其在欧洲地中海世界扩张期间完善了自身的建构，并成为中古时期该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元素。又譬如欧洲古典的地中海文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它不是在日耳曼民族迁徙浪潮中发生了退化，而是在融合其他文化因素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欧洲文化出现了重生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新型的欧洲中古文明。这就突破了按照罗马帝国政治史框架分析历史进程的理念。

其次，其研究覆盖的地理范畴和时间概念不同。以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代表的“衰亡说”主要关注罗马帝国的东、西部，并以西部帝国为侧重点，这就将其研究的时空范围局限在地中海世界。“晚期古代学派”将研究视角放宽到整个地中海和欧洲世界，不再局限在阿尔卑斯山脉南侧和多瑙河南岸地区，他们尤其侧重于地中海东部沿岸西亚地区多元文明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古典地中海世界的分裂，和欧洲中古文化中

¹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pp.19-20;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No.61, 1971;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200-1000 AD*, John Wiley & Sons, 2003; Chapters 21 & 22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III,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W. Bowersock etc., ed.,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Press of Harvard College, 2011, ix;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http://www.princeton.edu/history/news/archive/?id=8949>

² Averil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 Routledge, 1993.

心逐渐从南欧北移至中欧西欧地区。这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疆域的时空概念，以文化地理为研究参照。

再者，其研究的侧重领域迥异。“衰亡”的观点倾向于从政治、军事、经济史出发，关注罗马帝国政权的兴衰变迁，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得出了衰亡的结论。“古代晚期学派”则将注意力转向以往忽略的文化、宗教和艺术领域，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这一时段内，环地中海世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是对欧洲古典文化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重要变革、创新。该学派认为，古代晚期最重要的变革发生在宗教和文化领域，这是一个文化交融、变革与创新的时期。古典的希腊—罗马传统、日耳曼各部落的“蛮族”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一时期相互交融，为原有的希腊—罗马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因此诞生了新的宗教、艺术、文学、建筑风格，造就了欧洲中古早期的文明形态，影响深远。

晚期古代学派的创始人们在各自的拜占廷研究领域勇于创新，大胆突破，不仅为拜占廷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且也再度彰显出国家拜占廷学发展的创新性。

国际著名拜占庭学家亚历山大·卡日丹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崔艳红

(·广州·510420)

摘要：著名拜占庭学家卡日丹先生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苏联时期（1922—1978年）和移居美国时期（1979—1997年），在苏联时期他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基础，同时也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提高了苏联在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地位。1976年，由于他的犹太出身，受到苏联反犹排犹政策的影响，他被迫移民美国。1979年，来到华盛顿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的拜占庭研究中心从事拜占庭史的研究工作。卡日丹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情有独钟的拜占庭学研究事业，他的学术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十分惊人，他一生共发表了20本专著和700多篇学术论文。他以博大精深的史学造诣、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国际拜占庭学界的一致好评。

关键词：卡日丹；拜占庭学；苏联时期；美国时期；顿巴登橡树园

The Famous International Byzantinist Alexander Kazhdan

Cui Yan-ho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whole life of the famous Byzantine scholar Alexander Petrovich Kazhda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1922—1978) and the U.S.A period (1979—1997), his education and academic studying in Russia was the base of his academic attainment, and in this period, his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raised the level of the Soviet Union in Byzantium. For his Jewish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anti-Semitism under Stalin, he was forced to emigrate to America in 1976. In 1979, he arrived in Washington, at the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Mr. Kazhdan devoted all his life in Byzantine studies,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were astonishing not only in number but also in quality, he published 20 monographs and more than 700 theses in his whole life. He was famous in international Byzantium for his academic attainment, matter-of-fact attitude, and indefatigably seeking spirit.

Key Words: Kazhdan; Byzantium;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American Period; the Dumbarton Oaks

¹本文所用资料由美国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艾丽丝·玛丽·塔尔博特(Alice——Mary Talbot)提供。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土耳其骁勇的士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544年后（1997年）的这一天，一位拜占庭学大师亚历山大·卡日丹先生也在美国华盛顿溘然长逝。卡日丹先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他热爱的拜占庭学研究事业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拜占庭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于他的逝世，《纽约时报》¹、《卫报》²、《时报》³、《每日电讯报》⁴、《实话报》⁵、《波士顿环球报》⁶、《华盛顿邮报》⁷、《独立报》⁸和美国联合通讯社⁹等国际知名报刊新闻单位都用较大的版面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君士坦丁堡陷落5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这位在拜占庭学研究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前辈，以表纪念。

卡日丹先生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苏联时期（1922—1978年）和移居美国时期（1979—1997年）。¹⁰他的前半生是在苏联度过的，在苏联时期他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基础。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卡日丹(Alexander Petrovich Kazhdan)，1922年9月3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他的父亲原本是一家皮革厂的厂主，30年代的大清洗使他被迫放弃了皮革厂的经营，转而从事化学工艺的研究工作，并且发明了一种润滑油，这种润滑油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广泛应用于坦克上。亚历山大的母亲出身犹太名门，她精通法语，热爱音乐和诗歌。在优越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熏陶下，亚历山大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学校里，深受老师喜爱，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莫斯科大学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的同学们纷纷应征入伍，由于高度近视，他没有去参战，而是转到乌法教育学院继续学习，1942年获得学士学位。194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后来转到了苏联社会科学院从师于著名的中世纪英国史专家叶夫根尼·柯斯明斯基(Evgenij Kosminskij)，当时，整理研究希腊文手稿是一项既艰苦又枯燥的工作，在苏联属无人问津的领域，但是他热爱这项研究，并准备为此付出一生。1946年卡日丹副博士毕业，但因为他的犹太出身，在苏联当时的反犹太政策下，他在首都根本找不到工作。此后的近十年中，他四处辗转，先后在伊万诺夫、土拉等省的教育学院和莫斯科西郊的大卢基(Velikije Luki)学院从事讲授世界上古史、中世纪史及拜占庭史的教学工作。从1956年苏联学术界普吹“解冻”春风，卡日丹先生也因此得以回到莫斯科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1年他有机会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从他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978年

¹ A.Kazhdan Dies At 74; Was Expert On Byzantine Rule,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June 8, 1997.

² Judith Herrin, Alexander Kazhdan: Byzantine path of a Russian scholar, *The Guardian*, Thursday, June 12, 1997.

³ Obituary of Alexander Kazhdan, *The Times*, Thursday, June 12, 1997.

⁴ Obituary of Alexander Kazhdan, *The Daily Telegraph*, Wednesday, June 11, 1997.

⁵ Alexander Kazhdan, Noted For Byzantine History, *The Plain Dealer*, Monday, June 2, 1997.

⁶ Alexander Kazhdan, 74; Scholar of Byzantine History, *The Boston Globe*, Sunday, June 1, 1997.

⁷ Leading Byzantine Researcher Alexander Kazhdan Dies, *The Washington Post*, Saturday, May 31, 1997.

⁸ Anthony Bryer, Alexander Kazhdan, *The Independent*, Thursday, June 5, 1997.

⁹ Alexander Kazhdan, *The Associates Press*, Saturday, May 31, 1997, PM cycle.

¹⁰ 关于卡日丹的生平简介，参见 Angeliki E.Laiou and Alice-Mary Talbot, Alexander Petrovich Kazhdan 1922-1997, *Dumbarton Oaks Papers*, DOP51, 1997; Anthony Cutler, Some Talk of Alexander, *Dumbarton Oaks Papers*, DOP46, 1992.

他离开苏联以前,他共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55 篇和 14 本专著,被誉为苏联拜占庭学界的“多产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使苏联学者的研究倍受外国同行的重视,提高了苏联在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地位。

卡日丹先生在美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这一人生转折使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6 年,由于苏联的反犹排犹政策,卡日丹的儿子戴维被聘为哈佛大学数学教授,移民美国。卡日丹和他的妻子穆夏(Musya)受到株连,处境艰难,穆夏失去了在出版社的工作,卡日丹失去了出国的机会,他的顶头上司也对他板起了面孔。再加上国内一些小的迫害和敌视,卡日丹下定决心移居美国。1978 年,卡日丹夫妇取道奥地利维也纳、法国、英国,来到美国。此间,他在经由各国作了一系列讲座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重视。1979 年 2 月,57 岁的卡日丹先生来到了华盛顿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Dumbarton Oaks)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并被聘为高级研究员,从事拜占庭史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他被苏联开除国籍,他的名字在苏联被禁止提起,即使是在注脚中也不允许。此后,他一直生活在美国,直到 1991 年 8 月,他应邀参加第 18 届国际拜占庭年会,才得以重返莫斯科,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祖国。1997 年 5 月 29 日,他因心脏病突发,在顿巴登橡树园的家中逝世,享年 74 岁。¹

二

卡日丹在苏联最初的学术重心是拜占庭农村的封建关系,后来逐渐扩展到拜占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他的文章内容涉及贵族政治、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社会思想、文献、教会、圣徒传记等各个方面。²1952 年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晚期拜占庭的农业史》(Agrarian History in Late Byzantium)一书,1960 年又出版了另一本专著《9—10 世纪的乡村与城市》(Country and City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1954 年他在《苏联考古学》杂志(Sovetskaja Archeologij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 7—11 世纪的拜占庭的城市》(Byzantine Cities in th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的论文,引起了包括乔治·奥斯特洛戈尔斯基在内的学者们的激烈争论。这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拜占庭中期的城市是否残存的问题,他依据考古学和货币学的资料,发展了从 7 世纪开始拜占庭城市不再持续存在的观点。虽然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但他的理论却越来越多地被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1971 年卡日丹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是关于 11 和 12 世纪拜占庭经济的真实性问题的,他从大量分散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形成了拜占庭 11—12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史著作。他的另一篇重要的论文是 1974 年发表的《11—12 世纪拜占庭的统治阶级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Byzantine Ruling Clas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这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他以具体的文献资料为基础研究了拜占庭贵族政治,包括家族关系、军事贵族与文职贵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大量统计性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拜占庭贵族政治的真实性的认识。文章一发表,就被翻译成了意大利语出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诞生了他的另一本书:《拜

¹ 有关卡日丹在美国的学术成就,参见 Alice-Mary Talbot, Alexander Petrovich Kazhdan: the American years, Byzantine Studies Conference(Dumbarton Oaks), 1998.

² 关于卡日丹的学术研究成果年表,参见 Simon Franklan, Bibliography of Works by Alexander Kazhdan, Dumbarton Oaks Papers, DOP46, 1992.

占庭的人民和权力》(1982),在他离开苏联后出版。

卡日丹先对史料的积累体现在他来到顿巴登橡树园之前就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把他的个人图书馆和大量的资料卡片从苏联带到了美国。在顿巴登橡树园的日子里,他继续从事许多早年研究的课题。他对11和12世纪拜占庭的研究包罗万象,不仅包括社会史和经济史,也包括文献史,他写了许多关于11—12世纪一些主要作家的个性和思想体系的优秀论文,都被翻译成英语,公开发表。因为受英语写作水平的限制,他在美国的研究都是与其他学者合作进行的,1982年,他与贾尔斯·康斯特布尔(Giles Constable)合作,出版了《拜占庭的人民和权力》(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一书,现在已印第三版,书中浓缩了他对拜占庭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拜占庭人”(homo Byzantium)的概念。同年他又与安东尼·卡特勒(Anthony Cutler)合作,发表了《延续与变化》(Continuity and Change)一文,这是他感兴趣的题目,他认为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着的事物:延续和变化才是拜占庭发展的原动力。两年后,他又与西蒙·富兰克林(Simon Franklin)合作出版了《11—12世纪拜占庭的文献研究》(Studies On Byzantine Literature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1985年又与安娜贝尔·华顿·爱泼斯坦(Annabel Wharton Epstein)合作出版了《11—12世纪拜占庭的文化变迁》(Change in Byzantine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一书,对11—12世纪拜占庭的贵族观念和皇帝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揭示了其变化过程。在晚年,他不仅关注拜占庭统治阶级,也关注上层建筑——拜占庭的观念和文化,还倾向于宗教方面的研究。他首先致力于研究伟大的神秘主义者西梅恩(Symeon)的《新神学家》。卡日丹早年对他的研究出版在1967年,第二篇文章则发表在1982年。此外,他还研究圣徒传记,早在1959年他便把《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尤西比乌斯的一生》(The Life of Patriarch Euthymios of Constantinople)译成俄文。20世纪80年代,他系统阅读了各个版本的从1到10世纪的所有圣男圣女的传记,做了大约16000张小卡片,以小传记形式编写。他最感兴趣的是原文中提到的事实,同时他也仔细记下了原文写作的时间,卡日丹先生对圣徒传记的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在《拜占庭》(Byzantium)杂志上发表了以《圣徒生平研究笔记》命名的一系列文章。他关于圣徒传记的另一部系统著作就是3卷本的《按年代顺序的从1到10世纪的圣徒表》(The List of the 1st-10th Centuries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这是一部关于325名圣徒传记书目的研究专著,对于每一位圣徒,他都列出该圣徒和圣徒传记写作的年代表、简短的圣徒传记介绍、所有传记版本的书目以及相关的二手资料。这项工作最初的草稿形成后,需要广泛细致的核对、编订和重抄才能出版,这是一份研究圣徒传记的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此外,他在研究中还特别注意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且要把圣徒传记作为证明他论文中关于拜占庭的城市从古代晚期到拜占庭中期转型的重要史料,他写了一份关于这一课题的专题著作草稿,但还没来得及发表。他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比如研究他们的讲道术和赞美诗的写作等。

卡日丹先生在顿巴登橡树园主持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牛津拜占庭学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的编写工作¹, 这一工程历时 7 年(1984—1991), 卡日丹组织了包括来自希腊、南斯拉夫、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亚美尼亚、科普特、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波兰等各国学者 128 人组成的编写组, 用 8 种不同语言编写词条, 这给他的校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还亲自撰写了全书 5000 个词条中的 1000 个。《牛津拜占庭学辞典》共三卷, 内容时间跨度大, 从 330 年 5 月 11 日君士坦丁大帝参加君士坦丁堡圣伊琳尼教堂的大弥撒 (High Mass), 到 1453 年 5 月 29 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破君士坦丁堡城墙, 内容涉及拜占庭历史的各个方面。这部辞书出版后, 很快获得了 1991 年 R. R. Hawkins 奖和 1991 年参考评论奖金 (Reference Review's Award) 的最佳专家参考书奖。90 年代以后, 尤其是他完成了《牛津拜占庭学辞典》的编写工作以后, 他还经常发起组织专题讨论会和座谈会, 在 1991—1997 年间, 他向 7 次专题讨论会提交了 6 篇学术论文, 内容涉及法律、意大利城市、圣徒传记、拜占庭宫廷和十字军等各个方面。在卡日丹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年中, 他制定了两个计划: 一是把他多年积累的 167000 张资料卡片中关于 8—9 世纪圣徒的生活的内容建立一个计算机数据库, 便于资料的查找和使用, 这一愿望在他去世几个月后实现了。第二就是计划与李·谢丽 (Lee Sherry) 合作编写 6 卷本的《拜占庭文献史》(History of Byzantine Literature), 内容包括 7—12 世纪所有的拜占庭文献资料。就在他去世当天, 他寄出了校对好了的即将在雅典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 这时第三卷也接近完成了。

三

卡日丹先生的好友安东尼·卡特勒称他是“绝对的坦白、异乎寻常的自信和顶级智慧的结合体。”²这是对卡日丹先生最真实的评价。是的, 他热爱历史研究, 把历史学家的工作看作是对社会和个人心理之间联系的理解。在学术思想上, 卡日丹先生强调全面地看问题, 反对把不同的事件进行“科学的划分”, 他提出, 神学思想、政治观点、艺术品味甚至土地关系在拜占庭学中都可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学家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他强调文化的同步性, 坚持文化的历史发展, 但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拜占庭是一个冻结的社会,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平衡, 不变化。今天的学术界能打破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卡日丹先生的个人贡献。卡日丹先生在研究中, 还关心具体的人, 他喜欢追溯个人的生活、家庭史、家谱关系等, 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这类研究中, 除了人名目录, 他多年的研究还形成了一本关于拜占庭统治阶级的专著——《拜占庭的人民和权力》。

卡日丹先生不仅重视历史的学术性, 还重视历史知识的大众化, 他的文章曾出现在《科学与生命》、《知识和力量》、《新世界》等杂志上, 他早年还曾出版过一些儿童读物, 诸如《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无神论》、《人是如何创造上帝的》、《追寻过去的世纪》、《从基督到君士坦丁》这样一些书。

¹ Alice-Mary Talbot, Alexander Kazhdan an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Alexander Kazhdan Memorial*, Moscow, 2001.

² Anthony Cutler, Some Talk of Alexander, *Dumbarton Oaks Papers*, DOP46, 1992.

卡日丹先生对顿巴登橡树园的拜占庭学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普通的谈话和更正式一些的研讨班上，和其他学者共同讨论拜占庭农业史和文献，他向同事们介绍了俄国和苏联的史料编纂法和书目。他是同事们的良师和顾问，经常向他们建议参考文献、批评的方法论和鼓励他们得出富有挑战性的结论。他也乐于阅读同事们所写文章的草稿，并且能在 24 小时之内提出一份重新抄写的修改稿。他对同行学者的慷慨帮助被传为佳话，只要向他提出问题，他马上就会找到参考文献或从他的资料卡片中找到相关的资料。他还欢迎同事们给他提意见，发现错误马上改正。

卡日丹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情有独钟的拜占庭学研究事业，他的学术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十分惊人，他一生共发表了 20 本专著和 700 多篇学术论文。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美国，除了要求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从来没有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卡日丹先生以其博大精深的史学造诣、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国际拜占庭学界的一致好评，他的逝世无疑是国际拜占庭学研究的一大损失，他和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间。

作者简介

崔艳红（1971—），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思政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研究专长：拜占庭史、中国近代灾荒史

联系电话：020—62865700，13826030519

电子邮箱：13126407322@126.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思政学院，邮政编码 510420。

关于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侯树栋

国外史家近几十年来在西欧中古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用力甚多，成果颇丰，令人关注。对中古早期诸多问题的讨论，不仅拓展了视野，也将认识导入更深的层次。一些学者呼吁应当承认“中古早期”这一学术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威克翰（C. Wickham）指出：“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其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合法性，绝不能以事后之见视之。400-1000年这一漫长的时间跨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绝不能以此前或此后的历程主导之。”¹ 麦基特里克（R. McKitterick）针对中古早期的政治历程强调：“尽管罗马遗产的力量长期存在，但在6、7、8世纪中发生的欧洲政治结构，应当按其自身来认识。把早期欧洲诸王国作为后期罗马帝国社会和政治模式的凌乱的翻版，是错误的，将其作为欧洲在11世纪以后出现的那种模式的雏形，也是错误的。”² 英尼斯（M. Innes）也认为，不能将中古早期的政治与政府看作只是典型封建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罗马制度的衰落与退化，应当让中古早期自身来说话，“中古早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有其自身的合法性”。³

西欧中古早期的国家问题是当代史家着力探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论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古早期的政治权力明显有别于罗马国家，当然也不同于近代国家。中古早期王国不是罗马国家的延续，也非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某种不完整的、模糊的投射，这是当代论者的基本共识。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直线的、目的论式的传统解说，在当代学者群里不再获得普遍认同。⁴ 论者普遍提出，中古早期的政治权力应当依其自身进行解释。在这一理路之下，论者对西欧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早期王国能否纳入“state”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范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关系、王权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实质是中古早期国家的性质和特点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涉及到中古国家与近代国家的联系与区别，也联系着中古早期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应当引起重视。本文拟对国外学者的相关探讨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初步阐发一些看法。本文只是一份草稿，供与会者批评和指正，旨在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¹ C. Wickham,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6.

² R. McKitterick, ed.,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400-1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5.

³ M. Innes,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Middle Rhine Valley, 400-1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

⁴ 德国学者贝洛（G. von Below）在20世纪初期的有关阐述，可以作为传统学说的一个代表，见他的 *Der deutsche Staat des Mittelalter: Eine Grundlegung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Leipzig: Verlag von Quelle & Meyer, 1925. 对贝洛学说的简要评述，见拙文“国家、王权与帝国：中古德意志政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欧洲西部地区从后期罗马帝国走进中古时代的历程，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国家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帝国转变为由众多王国构成的世界。¹显然，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时间跨度达几个世纪。讨论中古早期国家，首先涉及的是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者的视角。用佛拉克里的话说，如果站在 500 年，我们仍然可以将欧洲文化归入“古典晚期”；到 700 年，“我们就牢固地站在中古世界了。”²此时中古文明的自我认同形成了：8、9 世纪以来的史书作者，不再将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追溯到罗马，而是归于自身。佛拉克里讨论了这些作者的历史观：

对于英格兰的比德来说，历史事实上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岛，中心内容是这些入侵者皈依基督教，所以集中叙述 7 世纪。在意大利，执事保罗写了伦巴德人的历史，而他对伦巴德人早期的历史或起源所知极少。就像比德的作品一样，保罗的史书具有强烈的当代信息。在法兰克，加洛林人的新王朝从事一项特殊的实践，即通过贬低前王朝来证明他们夺取权力的合法性，由此大力诋毁墨洛温王朝。他们撰写的其实也是新近的当代史。所以，在上述所有三个地区，与罗马的连续性这种意识中断了。³

历史从后期罗马帝国演进到中古时代，既有连续也有断裂。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文化、法律等不同方面着眼，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政治和政府层面在这一历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向来作为历史断裂的重要论据。近来论者却普遍用“同化”和“转变”描述从后期罗马帝国到中古时代的过程，包括政治和政府方面的演化。所谓“同化”，其实是强调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等多方面因素的融合，所谓“转变”，是指“同化”的同时，也是适应各地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过程。中古早期王国根本有别于罗马政治，它们的确立和发展，是“转变”的结果。仅就这一结果来看，从后期罗马帝国到中古时期的政治和政府演化，似乎仍然可以说是断裂，或者断裂大于继承。然而就过程来说，中古王国的发生和发展既是各种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选择”和“调适”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从罗马向中古社会的“转变”。其间，一些罗马传统和制度是逐渐消退的。对此，麦基特里克提供了如下看法：

在西欧所有新发生的这些王国内，各地对西罗马皇帝的消亡引起的政治振荡的反应大不相同。但是，根本不存在外来的政治制度生硬而直接地强加在被征服者的身上的情况。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伦巴德人等这些新来

¹ I.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p. 1.

² P.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1 c.500-c.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³ P.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1 c.500-c.700*, pp. 3-4.